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5.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 国家治理的实施路径探析

季春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北京100009)

摘要:在开山辟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实施国家治理进行了艰辛探索。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双管齐下、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刚柔并济,是有效推进新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路径,对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也为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并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毛泽东;国家治理;实施路径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5-0017-09

在浩浩汤汤、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历经繁荣昌盛和沧桑巨变。1949年10月1日,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中国的诞生,在开启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同时,也开创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范式。在开山辟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实施国家治理进行了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符合新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为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也为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并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 民主与集中辩证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作为新中国的重要缔造者,毛泽东将“民主集中制”创造性地应用到了新中国的国家治理当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

(一)“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①

发扬民主是新中国国家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调动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积极性的有效方式,“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②。

1. 确保民主的人民主体地位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毛泽东,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为人民服务执政理念的指导下,新中国破除了桎梏人们自由的封建专制,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49年10月24日,毛泽东就指出:“应当说,一切都是为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人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③这一论断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地位,也显示出了新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指向。为从根本上发扬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地位,新中国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毛泽东强调:“我

收稿日期:2022-05-16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AHSKZ 2020D21)

作者简介:季春芳(1982—),女,安徽芜湖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研究、中共党史研究。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①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才能对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内部的民主。

2. 开拓民主的多元路径

为切实保障民主的广泛性,毛泽东立足新中国客观情况,广开言路,博采众长,以多维视角、多种渠道开拓民主的多元路径。在政党体制上,当一部分人认为民主革命已经结束民主党派应该解散时,毛泽东坚持中国共产党要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指出:“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于巩固统一战线、发挥各党派人士群策群力建设新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在坚持中央对地方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外,还要求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适度扩大地方权力,并提倡中央在处理与地方相关事务时,应同地方商量,充分尊重地方权利。此外,毛泽东还创造性地要求充分扩大企业自主权,将民主精神渗透进经济体制,形成全社会的民主氛围。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指出企业“要有点‘独立王国’”,“如果因为反对独立王国就把一切独立自主都反掉了,没有一点自主权了,那事情也很难办”^③。毛泽东在开拓民主路径上所做的努力,为中国的民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 把握民主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历史经验、把握国际民主进程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并

将其积极运用到新中国的治理实践当中。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一方面,我们要客观对待西方民主,肯定其在社会主义诞生以前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在制度构成、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上,较之封建专制的确有进步之处,因此有值得新中国借鉴的地方,但必须要杜绝其不利一面,严格防止极端民主化,避免过度自由化。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始终坚持民主的社会主义性质。还在中共七大的时候,毛泽东就表示:“我们实行革命人民的民主,它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旧民主是不同的。”^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一再强调我国各项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将其与国家的建设发展紧密联系,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⑤。

(二)“我们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⑥

一切发展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实现正确的集中。回顾新中国成立前的党史,没有集中,我们就不能胜利,没有集中,我们就要被消灭。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治理是一项艰难复杂的巨大工程,没有集中不行。

1. 集中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国家治理是一件关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需要凝心聚力、群策群力。还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坚持发展民主集中制思想,并将其从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上升到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要求“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⑧。在信任人民群众的同时,毛泽东还高度肯定了内蕴在人民群众中的伟大力量,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

①《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0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4页。

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①广大人民群众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本,也是新中国建设发展的力量之源,因此,国家治理必须充分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积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

2. 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②统一和团结,既是国家治理的基本保证,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强有力的集中,能够统一意志,集中意志,合理避免不必要的意见分歧,有效增进团结,规避涣散,从而提升党和国家治理的行动力、执行力。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高度评价了民主集中制下国家的统一团结对于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年中,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胜利,我们是依靠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才获得的。”^③这一表述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集中各民族、各阶级、各民主党派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建美好新中国的客观事实,对于当时继续沿用并丰富发展民主集中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3. 提升国家治理的效能

如何在一个历经百年战乱的区域广阔、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开展国家治理,是一个大难题。长期的革命斗争用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仍然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④。早在延安时期,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⑤上述“四个服从”既反映了民主又体现了集中,确保了我们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有力。在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中,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毛泽东逐渐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范围扩展到“工、农、商、学、兵、政、党”等多个领

域,逐步实现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在党强有力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如火如荼,而凯歌行进时期我国取得的各项成就也充分说明,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对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具有重大作用。

(三)“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⑥

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二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没有民主,集中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民主,集中就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1. 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民主是相对的,绝不是无底线无原则的放纵和绝对自由,“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⑦。新中国虽然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但还面临着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没收官僚资本与建立国有经济、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等一系列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此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等,都需要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集中领导。“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只有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才能迅速巩固新生政权,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彻底保障人民民主。片面强调民主而忽视集中很显然是错误的,东欧剧变的残酷事实,也证实了我国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是符合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

2. 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对于集中的理解,毛泽东曾做过这样的定义:“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是一个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大型加工厂,而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185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73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意见和建议,则是这所加工厂的原料。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广大人民群众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不真实的材料决定国家治理的相关问题,就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主义或凭空臆断的主观主义,必然会给国家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要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加强集中,要让群众讲话,要注意听群众讲话。

3. 民主和集中相辅相成

在艰辛探索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选择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方式,既发扬了民主的作风,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又发挥了集中的作用,集思广益、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新中国欣欣向荣、节节向上的发展过程中,哲学思想底蕴深厚的毛泽东将民主和集中辩证地统一起来,对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向来高度重视民主集中的毛泽东,在1957年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再次强调:“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①民主和集中相依相存,相互裨益,片面强调哪一个方面都不好。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大国,亟需充分发挥民主和集中的合力。

二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双管齐下

毛泽东虽未明确使用过“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具体表述,但其基于国家治理站位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思想却内容丰富、意蕴深刻。毛泽东积极推进法治体系建构、强化人民群众法治意识,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努力发展共产主义道德,以实际行动为新中国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②

旧国家机器的打碎和旧社会制度的废除,客观上要求重构一套新的、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国

家管理模式,从而确保新国家机器稳定健康运行。延续过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法治思想虽有萌生和发展,但较之世界历史的法治进程,还是有所滞后。为从根本上保障新中国人民的各项权利,推进国家治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法治观的指导下做出了不懈努力。

1. 建构法治体系,确保有法可依

建构一整套体系完备的法治体系,是落实依法治国的必要条件。“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推动各项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马克思主义法治观是毛泽东建构新中国法治体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新中国的法治体系必须能反映人民的意志,并保护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和各项权利。苏联和西方国家的法制建设是毛泽东建构新中国法治体系的重要参考。学贯中西的毛泽东辩证考量了国外法制建设的利弊,在探索新中国法治建设道路时曾指出:“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的好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④此外,博古通今的毛泽东还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强调法律制度对于国家安定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

为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毛泽东在废除旧法统基础上,积极创建了一系列符合新中国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的《婚姻法》,保障了女性的权利地位;《土地改革法》解放了广大贫下中农。1951年通过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打击了威胁国家安全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1952年通过的《惩治贪污条例》,为从严治党、确保执政党的清正廉洁做出了重大贡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献。尤其是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宪法草案的讨论过程中,毛泽东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①毛泽东肯定了宪法的重要地位,并结合当时国家的主要任务阐明了宪法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②此后,党的八大决议指出:“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③新中国法治体系的建构,有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

2. 强化法治意识,确保有法必依

封建社会长期的“人治”思维,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根深蒂固。为破除陈旧思维,改变人民群众法治观念淡薄的境况,毛泽东一再强调法治对于国家社会的重要性,强化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他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④毛泽东深入浅出地道出了法律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于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要求广大领导干部要向人民群众讲通、讲透法律的好处,让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维护新中国的法治体系。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国各地通过群众座谈会、搭台唱戏、广播报纸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逐渐将法治思想深入到了人民群众当中。为帮助人民群众合理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全国还逐步建立起多处律师协会和法律顾问处,据统计,“至1957年

6月,全国已建立19个律师协会,800多个法律顾问处,有近3000名律师”^⑤。

为维护法律权威,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一直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严格遵守新中国的各项法规制度。1951年底,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了时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贪污腐化的罪行。刘、张二人曾在革命年代对党有过重大贡献,但依然被判处死刑。法律是神圣的,也是平等的,党的领导人更应是遵纪守法的践行者,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党的清正廉洁,才能不断增强党的执政公信力。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又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强调:“(这个宪法草案)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⑥毛泽东严肃要求大家对法律要心存敬畏,提倡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决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任何个人、任何组织。

(二)“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⑦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都还处在探索阶段,毛泽东在逐步落实依法治国的同时,还将“德治”纳入了国家治理的范畴。在那个特殊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虽不算富裕,但由于道德文明的良好发展,社会风气的健康向上,人们的内心世界富足愉快,精神风貌蓬勃昂扬^⑧。

1.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道德与政治的结合,既是治国之道,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早在《论语·为政》中,孔子就曾提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⑨毛泽东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德治”文化,并结合新中国的具体情况,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积极推进以德治国。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330页。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年版,第92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⑤王朝柱:《开国领袖毛泽东》,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⑧许浩:《毛泽东与新中国治理——第十二届全国“毛泽东论坛”综述》,《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⑨《论语·为政》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毛泽东高度重视执政党自身的道德修养。为防止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党员干部骄傲自满情绪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团结,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有预测性地提道:“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良好道德品质。同时,毛泽东也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建设。1949年9月29日,毛泽东为《新华月报》创刊号写下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②的题词,用正确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大众的日常行为,规范大众的实践活动,增强人民群众自治的内生动力。

教育培养品德高尚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是推进以德治国的必要之举。为适应新中国建设发展需要,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③。这些品德优秀的新生代对于国家的进步发展尤为重要。在后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又谈到:“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④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也是共产主义道德核心,毛泽东高度重视青年一代集体主义观念的教育和养成,积极塑造国家未来力量积极、健康的价值观,这对于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维护国家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2. 发展共产主义道德

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道德类型,与一切剥削阶级道德和其他阶级道德有着本质区别。发展共产主义道德,培养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于促进以德治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毛泽东始终坚持以共产主义道德来教育人民。

要发展共产主义道德,就必须摒弃旧社会不良落后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在毛泽东

看来,“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⑤。与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同,无产阶级执政党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⑥。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信赖,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得到显著提升。

要发展共产主义道德,还要从娃娃抓起。毛泽东认为,儿童时期就应该发展共产主义情操、培养英雄主义气概。“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⑦。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新中国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持续发展培养了大量后续人才,为党的国家治理持续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同时,发展共产主义道德,党员干部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尤其不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毛泽东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也做出了严格要求,“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⑧,这对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三 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刚柔并济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深谙唯物辩证法的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运用自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将上述思想应用于国家治理当中,成功取得了国家治理的重大成就。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题词墨迹选》,人民美术出版社、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9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6—77页。

(一)“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①

无数革命先驱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今后将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毛泽东在国家治理中深思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客观难题,毛泽东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原则的坚定性。

国家治理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开始了寻求国家出路的艰辛征途。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到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从康梁的维新变法到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历史以残酷的事实告诉人们: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奋勇前行,才是最正确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时代的转型,面对社会的变化,中国到底要向哪里去?在一部分人对资本主义尚存一丝幻想的时候,毛泽东坚定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②而自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和人民生活面貌的大幅改变,也证实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国家治理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新中国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改变了千百年来人民倍受压迫的困苦境地。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处于人民对立面的敌人实行专政,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神圣地位不受侵犯。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③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农业生产是为了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也是为了人民;开展一五计划、建设现代化国家还是为了人民。新中国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服务人民群众,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则坚持。

国家治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④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到底。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高度强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⑤,并将其与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全面、完整、科学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提倡全国各地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要求“争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⑥。为此,全国各地在中央的号召下,通过“健全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求各级党委认真重视教育工作”、“把协助党委掌握和领导干部理论教育的工作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以及“建立严密的组织和健全的制度”^⑦等措施,有系统地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活动,大大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

国家治理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指导伟大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需要伟大的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腥风血雨的革命岁月更是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1957年3月2日,毛泽东基于长期革命和七年多国家治理的经验自信地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除了人民的利益,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老百姓们才能过上安定的好日子。“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党的领导这一坚定原则。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8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⑦安徽省档案馆:《安徽省1952年下半年在职干部理论教育计划(草案)》,卷宗号J005-1-11。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二)“原则性要灵活执行”^①

在坚持原则坚定性的基础上,毛泽东还充分把握了策略的灵活性,妥善处理了国家治理中遇到的疑难杂症,为其后党的国家治理积累了实践经验。

在指导思想上,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综合考虑了原则与策略之间辩证统一的矛盾关系,为新中国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遵循。1945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要在坚持原则坚定性的基础上,“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②,彰显了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领导艺术,为其后的全国执政提供了重要参照。基于事物发展的渐进性和曲折性,毛泽东还理性认识到目标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合理差距。1953年6月3日,毛泽东就团章草案的具体规定和实际执行情况之间的差距,语重心长地指出:“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③要求在青年团的实际工作中要注意策略的灵活性。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种各样的问题纷繁复杂,短时间内快速解决所有难题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在坚定原则的基础上,灵活把握策略,厘清轻重缓急,抓住主要矛盾。此外,毛泽东还以其开阔胸怀提出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接受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可以放弃的意见,既和犯错误的同志在坚定原则基础上讲斗争,又和犯错误的同志在灵活策略下讲团结,并于1957年11月8日再次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④上述论断深化了人们对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认识,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的效率,为新时代党的国家治理提供了思想启迪。

在实践行动中,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处理了新中国在国家治理中遭遇的难题,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被动为主动。在国家的性质问题上,一

方面,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要求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制度,指出“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另一方面,毛泽东又灵活地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方法,确保社会的稳步过渡,指出“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⑤。在国家的经济问题上,一方面,毛泽东坚持“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体现了集中领导的原则性;另一方面,又允许“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规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⑥,体现了民主自由的灵活性。而在处理受普遍关注的利益分配时,毛泽东则既要求增加积累,重点发展生产,又要求兼顾消费,在合理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尽力改善人民生活。在国家的主权问题上,一方面,毛泽东坚决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在就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条件是:只能一个中国,不仅要进入联合国大会,而且要进入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否则就不干。”^⑦耿直率性地反对了美帝国主义国家意图将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罪恶行径;另一方面,毛泽东又灵活指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可照旧。”^⑧这也为后来解决港澳台问题和实行“一国两制”提供了思想基础。

新中国是一个既不同于传统封建王朝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苏联的全新政权,在国家治理上,没有任何现成模板可以直接套用。在万事开头难的初创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实施国家治理进行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⑦《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5页。

⑧《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4页。

了艰辛探索并取得伟大成就。当前,深入学习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国家治理的实施路径,对于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O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Mao Zedong's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Early Periods of the Founding of P.R.C.

Ji Chun-fang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Party with Mao Zedong as the core made hard explorations on how to implement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democracy and centralism,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tue went hand in hand, and the combination of principled firmness and tactical flexibility, were the important paths to promote national governance effectively in new China, and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In the meantime, it also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gav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Mao Zedong; national governance; implementation path

(责任校对 唐尧)